

武大两原校领导涉嫌受贿被捕

该校东湖分校校长称此案与该校没有干系

本报武汉 10 月 11 日电 （记者顾兆农）武汉大学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昨日向记者证实：该校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原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受贿罪，先后于 9 月 13 日和 9 月 26 日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陈昭方被捕后已被免去常务副校长职务，龙小乐在被拘留前已被免去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职务。两人均为正厅级干部。目前，此案正在侦查中。

10 月 9 日，两校领导被捕事件先在该校校园网上公布。10 日 16 时许，该消息的浏览量为 1.41 万次，半小时后，即增加了近 500 次。至 10 月 11 日 16 时许，浏览量已激增至 3.4 万次。此



事受关注程度之高，可见一斑。

针对某些媒体此前报道的此案

为 35%，今年初，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

让与收购的协议，由田野集团收购弘

案情可能包括武大的基建工程及“武大和两家私企投资近十亿元合办的武大东湖分校”，今日武汉大学校长助理、武大东湖分校校长彭宇文教授面对记者求证时称：该校的基建工作完全由投资方掌控，该校原先的投资人为湖北田野集团和弘博集团，前者控股 65%，后者

博集团东湖分校的全部股份。目前，该校已投资 6 亿多元，而不是某些媒体说的 10 亿多元。该校教学和管理等秩序正常，财务上没有发现任何违纪违法问题。

这并非武汉高校被曝光的首起腐败案件。湖北的 7 所部属院校中，就有 3 所校级领导有贪污腐败行为，而这 7 所高校的中层干部中，都出现过经济问题。地方院校情况也大致相当。今年以来，湖北地方院校中，就查出 2 所高校领导存在违法违纪。据分析，问题多出在基建、招生等环节。

本报将继续关注此案的进展。

高校领导干部任期中的管理，进行有效的监督？从现在看，虽然有年度述职制度，但形式的东西多，实质的内容少。对大多数群众“不信任”的领导干部，很多都没有及时调整。许多上级的调查也往往是在“东窗事发”后才介入。

其实，让各种不同专业背景的教授们去管建楼盖房一类的事情，即使不“出事”，也很难“出彩”。因为，即使是教授，也不是万能的。高校行政、后勤社会化的改革能不能更彻底一些？以建楼为例，国外流行的“建筑代理制”模式，是否可以更多借鉴？以专业人做专业事，单位的事最大限度地让社会去做，这样，不仅利于减少腐败的机会，也利于提高做事的质量。

说到底，高校成为贪污腐败高发区，也是在警醒执政者，对大学的改革不能拖延了。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加强对

地扩大招生，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恐怕都是空前的。但也因此，高校领导干部在校园建设、招生、采购等方面的贪污腐败，也很突出。看看那一连串“高校腐败案”榜单，实在让人沉重。

如何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这是一个现实的课题。高校党政“一把手”多为厅级或副部长级干部，监督却存诸多问题。制度设计上，能否多研究一些有效的办法，既杜绝“带病提拔”，也预防“发烧生病”？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加强对

快 评

高校腐败：不得了，得根治

鄂 言

“你看看，连老知识分子也这么干，真是不得了！”一位 80 多岁高龄的老人看到武汉大学两位校级领导“犯事”后，这么感慨。

的确，当教授高官沦为“阶下囚”，怎不令人痛心，怎不让人震动！

高校当然非“净土”，它是社会的一个部分，社会上的腐败现象，高校也会有。不仅湖北高校查出了问题，其他地方的高校也有不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北近期在武汉大学查处了两位教授高官，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高校官员，尤其是书记、校长等“高官”的任职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滋生了高校特殊的腐败问题。

这些年，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猛，但各种矛盾与问题也集中显现。以湖北为例，其高等教育规模，居全国前列。全国共办了 320 多家独立学院，湖北就有 31 所。2008 年，湖北考生被高校录取的总数，超过了 1981 年全国高校录取的新生总和。近年来，沿海某市，就兴建了 3 个大学城。在较短的时间内，如此大规模地大兴土木，如此成倍

地扩大招生，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恐怕都是空前的。但也因此，高校领导干部在校园建设、招生、采购等方面的贪污腐败，也很突出。看看那一连串“高校腐败案”榜单，实在让人沉重。

如何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这是一个现实的课题。高校党政“一把手”多为厅级或副部长级干部，监督却存诸多问题。制度设计上，能否多研究一些有效的办法，既杜绝“带病提拔”，也预防“发烧生病”？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加强对

“爱心宝贝”笑迎世博

10 月 10 日，上海·都江堰两地儿童爱心传递迎世博“爱心宝贝行动”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

“爱心宝贝行动”是由上海市儿童基金会、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和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该项目通过向社会募集捐款、赠送少年儿童储蓄罐储存零花钱，来资助家庭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儿童顺利完成学业。据了解，该项目筹集的公益善款将主要向四川都江堰等地区儿童赠送“爱心包裹”，邀请都江堰小朋友来上海共享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等项目。

杨 毅摄



中国 22 个世界“非遗”申请项目全部获得通过，在入选名录国家中，以总数 26 项名列第一

“非遗”项目迎来“中国年”

本报记者 杨雪梅

9 月 28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 76 个项目，其中，中国申报的 22 个项目全部列入。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共有 166 项入选该名录，中国以总数 26 项名列第一。相关人士估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他国家很难超越这个数量。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大规模地获得世界认可，背后的意味是什么？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庆善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数目不是多而是少得可怜 中国还需承担更多责任

记者：之前，好像是两年一次评选，每个国家一次一项。这次仅中国，一次性就通过 22 项，这在意料之中吗？

张庆善：应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评选规则改变了。如果两年

一次、一次一国只能评选一项，恐怕许多濒危遗产等不到进入名录就已经无处可寻了。

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与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一个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与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方面，一般不可能有可比性。所以，在数目上，绝对地追求国家的平等，其实是对各种文化的不平等。作为文化资源丰富的古国来说，中国这次通过的项目多，也就不意外了。

这既是对中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可，也是对这些年我们不遗余力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种肯定。

同时，这也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中国能在保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方面承担更大更多的责任。

我必须强调一点，虽然目前中国已经有 26 项列入世界“非遗”名录了，但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太多了。我认为依然少得可怜。日本有 16 项列入名录，这次也有 13 项入选。它们一个市或县的某个节日的某种舞蹈，都

因为得到很好的保护而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而我们的春节、中秋节这样大的节日都还没有进行申报。

22 项体现了文化多元性 今后多与周边国家合作

记者：这次获得通过的 22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什么特点？

张庆善：一是对世界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如安徽宣纸、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养蚕及制丝工艺、龙泉青瓷的传统烧制工艺等。二是，体现文化的多元性，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了充分的关注。这次有藏剧、新疆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呼麦歌唱艺术、贵州侗族大歌、中国朝鲜族农乐舞、甘肃花儿等民族艺术形式，此外，妈祖祭祀仪式的入选也是众望所归。

记者：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端午节的入选。

张庆善：端午节的世界影响很大。在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也会欢庆龙舟节。所以我们就委托了湖北牵头，协调湖南与江苏共同来申报。而

且，我们的端午节与韩国上次申报的江陵端午祭完全是两码事，我们有我们的典型传统习俗。

记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鼓励联合申报。我们这次入选的好像都是单独申报。

张庆善：文化是有辐射性的。鼓励联合申报，是为了共享资源，更完整地进行保护。比如以前的长调我们就是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中国的文化对周边国家的辐射与影响一直都很明显，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相关调研，今后会与周边国家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预备清单上还有 1000 多项 探索“非遗”生产性保护

记者：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申报有预备清单，“非遗”的申报呢？

张庆善：也有清单。我国已有 1028 项国家级名录项目，这就是今后申报“非遗”名录的预备清单。

记者：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对“非遗”的提名数量表示关注。今后，我们是否不太可能一次通过太多

链 接
近年部分高校腐败案
□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总额达 1400 多万元，判处无期徒刑。
□延安大学原校长惠延德在任榆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期间受贿 60 余万元，判刑 13 年。
□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 160 多万元。
□浙江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白同平受贿 65 万余元，判刑 11 年。
□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刑 10 年。
□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受贿 25 万余元，判刑 5 年。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基建处原处长李庚耀、副处长周荣海因犯贪污、受贿罪，分别判刑 7 年和 3 年。
□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受贿 80 多万元，判刑 13 年。

近日，英国《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推出 2009 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国的香港大学排名第 24 位，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分别排第 35 位和 46 位，中国内地只有清华大学进入前 50 名，名列第 49 位。

对这家机构的世界大学排名，人们并不陌生。5 年前，就在这个排行榜上，北京大学赫然名列第 17 位，一年后又上升两位。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被甩在了后面。对此，排名第 17 的北京大学一位著名学者就一笑置之：“我的第一感觉是，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周星驰版’？”

认为排行榜“无厘头”，并非没有道理。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在跨越发展，且成绩斐然，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还很明显。这一点，我们当有自知之明。

大学排行榜的兴起，是近几十年的事。在美欧一些国家，有些机构很热衷做这样的事。有意思的是，为大学排名的大多不是权威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而是一些新闻媒体。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要算《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最佳大学排名”，但也有不少批评之声。

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对大学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学排行榜也跟着热闹起来。但客观地说，对这些排行榜的“权威性”，不敢恭维。主办机构是否权威暂且不说，评价标准是否科学姑且不论，用变相收费的办法搞“潜规则”，只这一条就令人生疑。难怪一些大学校长说，这些排行榜不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价为目的，而是牵手“孔方兄”，追求“含金量”，不信也罢。

尽管有颇多争议，但大学排名也并非“毫无意义”。这是因为，大学排行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公众了解和选择大学及专业提供一定帮助。特别是在我国现行的高校统一招生体制下，考生所能填报的志愿有限，对高校的了解与选择更加迫切。一个科学、公正的大学排名，可以作为考生与家长的报考指南。简单地以行政命令禁止大学排行榜，既不明智，也无可能。

因此，大学排行榜应当自尊、自重、自爱，肩负起社会责任，起码应以科学的态度、学术的原则，构筑评价体系，完善评价标准，逐步树立公信力。若是以追求“含金量”为出发点，忽悠公众，误导公众，毁了自己的声誉，也砸了大学排行榜的牌子。

至于国外的大学排行榜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我们不必太当回事。关键在于，大学应当摆正心态，理性对待。正如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所说，大学毕竟是教书、育人和研究学问的地方，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才是头等重要的。如果追着排名跑，就会丢了“魂”。

文化博客

http://blog.people.com.cn

最低 50 元，最高 280 元

北京国际音乐节 票价“亲民”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记者周宁、杨志刚）10 日晚，为期 21 天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拉开帷幕。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著名指挥家余隆详解了此次音乐节的三大关键词。

最大看点：《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摄制 30 周年纪念音乐会

1979 年，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访问中国，以此拍摄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真实地记录了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敞开胸怀、了解世界的历程，荣获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今年 10 月 30 日，一场名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摄制 30 周年纪念音乐会”将在保利剧院上演。

“大提琴家王健、小提琴家李伟刚等都曾在该纪录片中出现，那时的他们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当时的斯特恩对这些正在琴房里练琴的孩子们说，‘每一个窗口都是一个天才’。”余隆说，“果然，30 年后，他们都已成为世界级音乐大师。本届音乐节把他们请回来，以他们个人的成长经历向广大观众透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事业的飞速发展历程，很有意义。”

运营模式：“内外部结构有待完善”

音乐大师彼得罗夫斯基曾把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瑞士卢塞恩音乐节和北京国际音乐节并称为“世界三大音乐节”。

余隆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尚需内外部运营结构进一步完善。“内部完善指管理专业化。音乐节在营销、推广、行政、财务等方面都需要各行各业的非音乐人士进入管理层，进行统一谋划。除节目部、艺委会等部门外，运营机构并非都需要‘音乐科班生’。”

“外部完善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余隆说，北京国际音乐节是公益活动，自然需要依靠赞助商投入。如何吸引赞助商？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值得借鉴。比如，对赞助公益性艺术活动的企业实施定项免税政策，间接鼓励文化产业投资。

立体票价：“不能把成本直接转嫁给观众”

据了解，本届音乐节采取立体票价，最低 50 元、最高 280 元的票价率先拉开了演出市场真正“亲民”票价的帷幕。

“票价居高不下是长期问题。票价的制定缺乏监管，好像投入大，票价就得高，我认为这是一种偏差。”余隆说，“不能将成本直接转嫁给观众，可以通过赞助、衍生品开发等多种回收投资方式减少对票价的依赖。”

余隆认为，对于普及高雅音乐等公益行为，就更要有回馈社会的意识，按照百姓合理的收入进行定价。“高质量的高雅艺术并不等于高票价，就像‘富人不一定都开好车’。”